

国家资本主义恶化市场环境

直言不讳 | Call a Spade a Spade

房产税改革到底由谁说了算

冯海宁

沉寂一时的房产税问题，日前又传出两条重要消息：一是有消息称，针对房产税的试点地区可能定在京、沪、深、渝四个城市。二是房产税改革面临选择困境，国家有关部门拟整合现有税种、开征新税，而地方政府只是改造现有房产税，将征收范围扩大到居民自住房屋。

有关房产税的各种传说在2010年有N种版本，至今依然是“讹传讹”。其实，无论在沪、渝两地先行试点，还是在京、沪、深、渝四地试点，都应该早日公开相关信息，让地方政府做相关准备，让公众参与制度酝酿。我以为，凡是房价过高、征税条件成熟的城市，都应该安排房产税改革试点，不要拘泥于三四个城市。

房产税开征的脚步声似乎越来越近，但采用何种方案目前还不明确，今年能否开征就变成了一个问号。如果采用地方改革方案，或许今年就可开征，但不符合中央部门税改思路；如果采用中央部门改革方案，既要经过一系列法定程序，又要做地方政府思想工作。可见，房产税改革依然是2011年最具看点、最具争论的一个公共话题。

当这一项改革面临选择困境时，解决手段有三个：一是综合评估两种方案的利弊，看哪一种方案更符合公共利益；二是将两种方案全部公开，交给公众来裁决；三是最终无论选择哪一种方案，都应该吸取另一种方案的长处。但到目前为止，公众看到的是选择困境，却不见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最近舆论批评最多的一个现象是“闭门立法”，如铁道部新规就被评论为闭门立法的典范。事实上，无论是有关部门酝酿房产税改革，还是地方政府制定各自征税方

案，都是“闭门立法”，征税方式、税率、免税等情况公众一概不知。一边是公众根据各种谣言传说胡乱猜测，另一边是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闭门立法”，这显然不是正常现象。

从目前报道披露的信息来看，显然中央部门的改革思路更合理一些。理由有四：其一，整合现有税种、开征新税，避免了重复征税等问题；其二，有利于税制统一，各自为政的征税方式显然不妥；其三，经过一定法定程序出台，能让房产税更规范更合理；其四，更为重要的是，房产税改革可壮大大方政府财力，部分纠正土地财政，为房价稳定或回归铺路。

反观某些地方政府设计的方案，目的只是筹集收入而已，并没有直指高房价，所以仅仅针对少数高端房产，难以对高房价、投资炒房真正构成威胁。一些房价涨幅很高的城市，担心改革会影响当地的楼市。土地财政始终是地方政府的最爱，要纠正这个问题有难度。

当然，并不是说没有解药。其实，一方面通过财税改革壮大大方政府财力，让财权与事权匹配；另一方面，可通过政绩考核让土地财政走开。但目前考核政绩还没有新标准。如此，即使给地方政府再多的财权，也无法满足其贪婪的欲望，因为长期的土地财政已经让某些地方政府如同吸了鸦片，上了瘾。

房产税改革究竟是谁说了算？表面上看，尽管房产税是地方税种，但审批权在中央，应该是中央说了算。但我以为，由于这一税种有调节收入、抑制房价、财税改革的目的，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因而应由公众说了算，中央有关部门有必要将两种方案晒出来，让公众从征税目的、公共利益等角度来投票、建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刺激经济的政策，投入了大量的金融与财政资源。这些政策在刺激中国经济迅速过热的同时，对中国市场有何深层的改变？会带来何种影响？

追踪研究近两年的财政、金融资源的流向就会发现，大部分的钱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以金融资源为例，在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信贷中，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项目。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过去一年的融资金额增长可能达5万亿。“4万亿”投资计划的落实，大部分也落在了政府投资项目，许多基建、高速铁路、能源等大项目的主导者，也是国有企业。就连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房地产领域，国有资本近两年也是狂飙突进，不计成本拿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

国有企业的势力扩张，再加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的自信心急升，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纽约政经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创始人伊恩·布里默在分析国际政治和经

济形势时，曾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感到担心。过去几十年来，私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消费者、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在受监管的自由市场模式下占据了支配地位，全球经济也与这一现象变得愈发息息相关。但除了自由市场模式外，还有一种国有资本模式，而中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金融危机中，美国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能力上升，再加上中国政府的过分自信以及中国模式的不同，这造就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布里默预计，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之下，中国将变得越来越不会对跨国公司开放。

中国是否正在滋长国家资本主义呢？客观来看，我们认为的确存在这种迹象。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及国有经济体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运营者。观察近年中国经济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国家参与市场的力度一直在加大。

首先，它表现为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政府的财力迅速增加，

2009年中国政府的收入超过6万亿元人民币，2010年的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但这只是中国政府掌控资源的极小一部分，如果算上土地、矿产、国有企业等资源和资产，中国政府堪称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掌握着如此巨额资源的政府，每一次调控经济时，都会在中掀起滔天巨浪，令企业之舟飘摇。

其次，国家资本主义还表现为国有经济体的市场控制力增强。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宏观调控，都会带来一轮国有经济的强化——它不一定是总体规模的增加，而是表现为对关键市场领域的控制力增强。这在金融、石油、电信、钢铁、航空、铁路、矿山等多个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形成了一次次的“国进民退”。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市场化了的国有企业相互“结盟”，通过市场准入优势抢占了新生的市场高地，通过资产收购结成更广泛的利益群体，进一步固化了利益集团的格局，对市场的控制能力比过去更强、更坚韧。

此外，国家资本主义不仅表现在国内市场，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中，国有经济体也是当然的主流，不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实业资本，不管是绿地投资还是金融资产投资，国有

经济体的能量都要比分散化的民营企业大得多。换句话说，国有经济体才是国家意志在国际市场的主要实现者。中投公司这类主权财富基金的出现，意味着国家财富以金融资本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也可以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体现。

这些变化在中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这些变化的背后，除了中国的政府部门逐渐滋长的自信外，还有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对市场利益的疯狂占有和自我强化。一个国家资本主义占据强势的市场，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不是一个理想的竞技场。如果国家资本主义的增长使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自负地相信，我们按自己的方式也能成功，不必考虑世界通行的规则，也不必继续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转型，那其中的风险就会不断积累。因为这会让中国忘记还需要进行哪些改革，也会使得未来的市场环境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加不利。

(文章来源于安邦智库《2011年经济展望报告》)

焦点评论

住房理性消费 倡导容易实行难

张东阳

近日有权威媒体发表文章称，2011年房地产市场调控仍将继续，市场有可能进一步企稳。在政策逐渐落实起效的同时，要让房地产市场真正实现长期平稳健康发展，还需要购房者转变住房消费观念，逐步树立“先租后买，先小后大”的理性住房消费观。

笔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对所谓的“超前买房”、“不理性”等说法持质疑态度。因为“无房不婚”、“一步到位”、“低龄购房”、“啃老购房”现象的存在，除受传统文化影响外，目前“影响最大”的因素不在其他，正在于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这一现实。当调控屡成“空调”，当“生地财政”一直如故，以致于一套普通房在半年甚至二三个月就会涨上数千万元的时候，普通老百姓能够“理性”得起来？

笔者一位朋友就领略了“超前买房”的好处。一年前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他“超前消费”按揭了第二套房子，结果仅一年时间就从那套房中直接赚了五万余元，而当地职工平均月薪只有千元左右！无意之间挣了笔“大钱”，这样的“超前买房”确实给那些正等待国家调控政策降低房价再买房的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再说租房，只要有充足的房源和合理的价格，相信没有几个人年纪轻轻就当上房奴。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稳定、充足的房源和优惠、合适

的房租价格并不具备。房价居高不下，房租也水涨船高，在房价畸高的北京，笔者的一位同学在中关村软件园附近日前租到15平方米的小房的价格是每月1500元，每平方高达100元，如果再租大一些的房子，估计与房贷的价格都差不多了。

从2011年起，我国将加大公租房的建设力度，但目前的情况是，国家要求建设保障性住宅，这些钱必须从卖地中取得。如果依靠“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卖不出高价，却又无力用来建设更多的保障住房。同时，即使倡导国人买房“先小后大”，现实中也缺少小户型房可买，因为开发商更愿意建设豪宅以追求高利润。显然，手里就没有多少钱的百姓之所以千方百计买房子当房奴，根本原因是因为房价高得离谱，涨得太快，百姓唯恐越等越买不起房子。与百姓不同，不少投资者甚至是不少贪官则把“涨声一片”的购房当成是一种投机和投资。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见，不少投资者囤积居奇，不少贪官动辄拥有数套甚至数十套房子，如上海市原房管局副局长陶校兴除拥有一套价值千万元的别墅外，手中还握有29套房屋。与此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变相阻挠，调控屡屡失效。

在此环境下，把普通百姓的买房行为当成“不理性”有失偏颇，因为老百姓目前的“超前买房”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无奈，谁又能理解他们如此“被选择”的痛楚呢？



史上最严是虚名，调控功过实效评。组合拳法欠火候，楼市价格超超挺。土地财政须斩断，信贷猫腻要肃清。挤压泡沫多给力，促安居者得民心。

朱慧卿/图 孙勇/诗

40亿元集资诈骗大案的警示

蒋悦音

因非法集资高达40多亿、受害者多达13万人而轰动一时的南京润在“集资诈骗案”近日落下帷幕，润在生物公司总经理孙海瑜被判处死刑，其余12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刑；南京润在生物有限公司以“联合种植开发灵芝”为由，许诺投资人高额回报、设骗局非法集资40多亿元，受害人遍布山东、北京、河北等十几个省份，所集资金主要用于归还前期的集资本金、高额利息、代理商及公司高管提成、个人挥霍、对外放贷等，截至案发时还有1.5万名投资人投入的6.5亿元集资款无法追回。

笔者以为，以“庞氏骗局”现代版为特征的各类非法集资诈骗大案的频发，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也使得许多群众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重要源头。这些涉及经济犯罪在现实中呈现出的诸多新特点，值得各方警惕并深思。

警示一，非法集资诈骗在发起人员上的“蚂蚁繁殖效应”，几乎已经成为一个规律。所谓“蚂蚁效应”是动物界的一种独特现象，当人们将抓到的蚂蚁剁成很多段扔掉之后，这些剁碎的蚂蚁段在不久之后居然会成为一条条的新蚂蚁。各类非法集资诈骗案或者传销诈骗案中，因暴利所惑的后来者如蚂蚁一般“阴魂不散”，南京润在案也不例外：润在案的主要涉案人几乎都

曾就职于南京金湾蚯蚓粉公司，该公司负责人数年前以“合作养殖蚯蚓”等诱饵实施非法集资诈骗而受到法律制裁，不过学会了这套“空手套白狼”伎俩的金湾蚯蚓粉公司市场部经理孙海瑜却又在数年后炮制出了更轰动的“灵芝版”非法集资大案。

警示二，非法集资的倒金字塔结构本质未变，但掩盖倒金字塔结构的“伪装”越来越多样化。是谎言终究有破灭的一天，非法集资的利益结构犹如一个随时会倒塌的倒金字塔一般，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因为所谓的“高额投资回报”加入其中，而这个畸形利益结构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后来者和资金加入才可能维系，这其中，无论是养蚂蚁、养蜜蜂、养蚯蚓、种灵芝还是种仙人掌的噱头，都不过是“吸金障眼法”而已。

警示三，利用人性中存在的贪婪弱点，是制造这类案件诈骗犯最擅长的一种技能。都是些很明显的漏洞在漏洞的谎言骗局，为何还是会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贪婪和幻想使其放松了警惕、忽视了常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生意可以如此无风险地获得超额回报，骗局泡沫的破灭也不会因为谎言叙述一万遍就真的成为不灭传说，这种庞氏骗局注定要让“接最后一棒”成为最终埋单人。

正所谓：“听故事”买古董，肯定是天价买废品；“听故事”买股票，肯定是被套；而“听故事”搞集资，进的肯定是骗局。

经济时评 | Hot Topics

齐鲁银行事件的反思与警示

余丰惠

随着调查的深入，日前引起警方介入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遭遇高额骗贷一案，其风险痕迹早在2010年年初就已露出端倪。

12月28日，坊间盛传齐鲁银行亏损60亿，加上其他总计亏损过百亿，董事长邱永章、行长郭涛“被扒”。60亿相当于齐鲁银行2009年全年4.88亿净利润的12倍多，而当年该行不良贷款合计才7.04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99%。后来又传工行、中信等多家银行牵扯其中。这些均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权威部门的权威消息。一时间，齐鲁银行事件扑朔迷离、纷纷扬扬。

但是，有一个事实可肯定。据新华社报道，济南公安机关近日宣布查获一起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件，涉及济南当地多家金融机构。以笔者看来，无论最终司法部门查处结果如何？涉及金额多大，涉及银行有多少？这起“大案”的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案都给我

们带来一些反思和警示。

这几年虽然银行金融监管部门越来越多，监管队伍越来越庞大，监管政策多如牛毛，天天喊与国际接轨，但在从事银行业工作几十年的我看来，监管取得的“成绩”远没有总结报告、汇报材料和公开报道中那么乐观和理想。客观地说，这么多年来在大型商业银行的改革上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对大型商业银行的监管也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早期的股份制银行、区域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的监管几乎放任自流，漏洞百出。这些银行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监管部门只是业务上的监管；受到地方政府等多方压力驱使，监管上尺度和执行力都大打折扣，甚至屈从于政府的压力和行政命令。这些银行的资产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内控风险都不容乐观。监管上的放任自流和失之于过宽是齐鲁银行出事的监管不力原因。实际上不仅齐鲁银行，如果对全国中小型特别是诸如地方性金

融机构进行一次全面的、严格的监督检查，肯定问题不少。

在多年货币超发背景下，商业银行过惯了“宽松”日子，习惯于在流动性泛滥下轻松经营。一旦银根收紧，市场流动性偏紧，立马原形毕露、无所适从，一些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正经事没有，歪门邪道不少，采取恶性竞争、票据抵押等手段吸收存款。这种吸收存款的手段必须由客户包括企业财务会计人员配合，银行内部人员不可能完成整个操作。这就给了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者以可乘之机。当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哈尔滨中行高山盗取10亿资金案件就是利用揽存款之机得逞的。去年央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得一些银行资金出现紧张状况，笔者曾经预言高息揽储将会很快出现，不幸被言中。由央行收紧银根到商业银行资金紧张，再到商业银行为了解解头寸资金紧张而高息揽储，再到出现伪造金融票证骗取资金大案，其中存在关联性。这一事件说明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竞争力极弱，

说明银行业监管防线不堪一击。

另一个需要思考的是，对金融风险、对银行经济案件问题采取“鸵鸟包火”的做法，结果是把小问题酿成了大问题，把小风险酿成了大风险。比如齐鲁银行事件，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早有预警和提示，结果是人员被换，最终酿成大案。现在许多银行包括公开上市的商业银行为何竟然封闭消息、封闭舆论，只要有负面东西一律不让报道，说是担心引发金融风险。其实在风险案件有苗头时就公开消息，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一方面锻炼了商业银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能把风险消灭在萌芽和初期，再一方面也能使得民众及时了解真实情况，避免被谣言所惑，俗话说谣言止于真相。这种“鸵鸟包火”做法已经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现在金融机构案件一旦“爆发”就是动辄上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案件，包括骗贷案件、不良贷款集中爆发案件、伪造金融票证案件以及内外勾结盗取银行资金案件等。因此，齐鲁银行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反思和警示是深刻的！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均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0755-83501640；发电子邮箱pp118@126.com。